

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

——历史的启示

赵华胜

[内容摘要] 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是两场发生在不同年代的不同战争,它们不仅是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也是事实上的俄欧之间的战争。从俄欧关系的角度,通过对两场战争的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揭示了俄欧矛盾具有历史根源,它们特别表现在地缘政治、文明认同、身份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恐惧上。这些矛盾由来已久,对俄欧关系产生着持续性的深层影响,在一定意义上,现在的俄欧冲突是历史上俄欧冲突的继续。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的结局可能不同,但在对俄罗斯内政外交的影响上,它们也有着相似的效果,也就是推动俄罗斯国内的经济、社会、军事改革。在外交上,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都促使了俄罗斯外交的转向,“转向东方”成为外交重点。两次“转向东方”的性质不同,但它们背后的支配逻辑相似,就是在西方方向受阻后,寻求在东方方向的发展作为弥补。

[关键词] 俄乌冲突 克里米亚战争 俄欧关系 相似性

[作者简介] 赵华胜,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D8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15(2025)04-0003-22

历史不会重复,但历史会有相似。尽管时空变换,但相同的主角、相似的地缘政治环境、一脉相承的精神文化传统,却可能使发生于不同年代的历史事件遥相呼应,使历史以某种新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重现。在俄罗斯的历史中,与俄乌冲突最有可比性的是发生于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这次战争与俄乌冲突相距170多年,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但许多要素和特征,包括决策的特

点、形势判断、对垒的阵营、战争的目标、战事的进程、武器技术的作用、对俄罗斯内政外交的影响等等,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一个国家不同战争之间存在相似现象是自然的,但相似性如此之多却不会全是偶然。对比俄乌冲突和克里米亚战争,可以看到许多有意义的历史内容和细节,发现它们的共同特点以及背后可能存在的某种无形联系和历史传承。

一、地缘政治之争的症结

不管是克里米亚战争还是俄乌冲突,虽然具体情形不同,但俄欧之间的地缘政治矛盾和竞争都是它们的主要根源。

历史上,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发生过多次战争,但都是与一部分欧洲国家交战、与另一部分欧洲国家联盟,不管是七年战争、反拿破仑战争,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如此。但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都是俄罗斯与几乎整个欧洲的对抗,这在俄欧关系史上是仅有的两次。

克里米亚战争发生时,19 世纪的欧洲是列强的天下,英、法、普、奥、俄五大国并列称雄,共同形成了所谓的大国协调体系。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除沙俄之外的四大列强都站在反俄战线一边,没有一个支持俄罗斯。俄罗斯不得不独自、同时在多个方向和漫长的战线(包括在波罗的海、白海、太平洋沿岸)上作战,其中主战场是在克里米亚和黑海地区。英国、法国、奥斯曼帝国以及撒丁王国(意大利前身)直接与俄军交战,其中英国出兵近 10 万、法国出兵 31 万、奥斯曼帝国出兵约 25 万;^①奥地利陈兵塞尔维亚边界,要求俄罗斯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否则将加入英法联盟;普鲁士虽按兵不动,暂时中立,但居心难测。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法虽也对俄罗斯实施了经济封锁,但贸易仍可通过未参战国港口进行。

反观俄乌冲突,不仅是俄罗斯与几乎整个欧洲的冲突,而且是与几乎整个西方的冲突。北约 32 个成员国和欧盟 27 个成员国,除了个别国家持不同立场外,

^① [英] 奥兰多·费吉斯著,吕品、朱珠译:《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 页。

都坚决支持乌克兰,强烈反对俄罗斯。它们向乌克兰提供巨大的政治和物质支持,对俄罗斯进行最严厉的制裁,其中许多国家直接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弹药和军事援助。俄罗斯与西方的政治、外交、经济、金融、能源、人文联系几乎被完全切断,被排斥和孤立于欧洲之外。俄欧对立与隔绝的彻底程度大大超过了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为俄欧关系历史上所仅见。

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都是首先在俄罗斯与弱小的邻国之间燃起战火,前者是在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之间、后者是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随后欧洲国家的介入,扩大成俄罗斯与欧洲国家间的大规模战争。土耳其虽是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但到19世纪时已羸弱不堪,沦为“欧洲病夫”。乌克兰就疆域和人口来说是欧洲大国,但相对于俄罗斯则是小国和弱国。在这两次战争中,欧洲都加入反俄同盟,与俄罗斯兵戎相见,区别只在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欧洲国家是直接参战,在俄乌冲突中欧美虽未直接出兵,但实际上深度参与,从传统意义上说已是交战的一方。^①

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都是由看似并不构成战争危险的事件引起。克里米亚战争的导火索仅仅是由于奥斯曼当局允许天主教徒持有伯利恒圣诞教堂大门的钥匙,可以自由出入马槽祈祷堂和圣诞石窟。当时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为争夺在巴勒斯坦圣地的权力冲突不止,那时巴勒斯坦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迫于法国压力,奥斯曼做出了对天主教徒有利的裁定,这激怒了沙皇尼古拉一世,他决定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惩罚,出兵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比萨拉比亚和摩尔达维亚两公国,由此酝酿发展成了克里米亚战争。战场之所以是在克里米亚半岛而不是在俄罗斯本土,是因为拿破仑三世接受了其伯父拿破仑·波拿巴深入俄罗斯腹地造成供给线过长招致毁灭的教训,克里米亚面向黑海,与盟军的大本营距离不远,后勤补给能够得到可靠保障。而俄乌冲突最早始于2014年乌克兰

^① “Trump: NATO is Actually at War with Russia,” EurAsia Daily, March 13, 2025, <https://eadaily.com/en/news/2025/03/13/trump-nato-is-actually-at-war-with-russia>. 乌克兰军队前总司令扎鲁日内证明,美乌在2022年夏季在德国的威斯巴登成立了联合指挥部,共同制订对俄作战行动。参见 Leyla Latypova, “In Russia’s Sakha, a Fallen Conscript’s Family Searches for Justice on the State’s Terms,” The Moscow Times, April 8, 2025, <https://www.moscow-times.ru/2025/04/08/zaluzhnii-podtverdil-cto-ssha-pomogali-vsu-planirovat-voennie-operatsii-protiv-rossii-a160376>。

国内政权更迭。在 2022 年 2 月冲突爆发前,乌克兰东部地区一直动荡不定,乌政府军与地方反叛武装的交火不断,《明斯克协议》迟迟不能落实,这种状态持续了 10 年,而且似乎还可能持续下去,但最终引发了俄乌冲突。

当然,这些都是表层现象,战争的起源都潜藏着错综复杂的因素。地缘政治竞争和势力范围争夺是俄欧关系的关键症结,也是俄欧矛盾的集中所在。克里米亚战争与俄乌冲突虽然具体内容不同,但在这一点上本质属性相近。18 世纪下半期和 19 世纪上半叶,俄罗斯东方政策的核心是南进,夺取伊斯坦布尔,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鼓动巴尔干地区民族主义运动,将这一地区纳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沙俄对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地区的野心严重触动了英法奥普的利益,引起它们的反对。英国担心俄罗斯可能扼住大英帝国通向它最重要的海外殖民地印度的通道;法国认为沙俄是它重建强大帝国的重大障碍,对法国的安全构成威胁,而且尼古拉一世是唯一不承认拿破仑三世君主地位的欧洲君主;奥地利担忧俄罗斯的行动会在它控制的巴尔干地区引起民族独立浪潮,导致一些民族地区脱离帝国。显然,如果沙俄目标实现,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将发生有利于俄罗斯的重大改变,英法奥等大国的利益和安全都将受到严重损害。源自于维也纳体系的“大国协调”是当时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它的实质在于:大国之间应协商解决重大矛盾,任何一国要改变均势状态,获得强势地位,都会引起其他大国不安,招致它们的联合对抗。因此,削弱俄罗斯帝国的规模和实力,防止俄罗斯获得优势,成为推动它们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最主要动机。

俄乌冲突虽发生在不同时代,且从俄乌关系的角度说,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评判的基本尺度,但从俄欧关系的角度来看,核心问题仍是地缘政治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和苏联解体后,在中东欧出现了一大片战略真空。国际政治中不允许战略真空的长期存在,它一定会吸引各种力量的涌入。俄欧在这片夹在两者之间的战略空间相遇无可避免,问题在于以什么形式:是作为俄欧的安全缓冲带、乃至合作区域,还是变为战略对抗的战场,这成为冷战后俄欧之间最大的地缘政治和地缘安全问题。也正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俄罗斯与北约的战略思想发生了正面冲撞,双方对乌克兰的战略定位完全相反,形成战

略冲突。由于俄罗斯的衰弱无力,北约开始迅速填补真空,进入原属苏联的势力范围,从巴尔干、中欧,一路前进到东欧,把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不断向后推压,俄罗斯的心理红线被一次次突破。在到达与俄罗斯直接接壤的波罗的海沿岸后,北约的目标又转向原苏联腹地的乌克兰,进入了对俄罗斯来说最关键也是最敏感的战略空间。

从传统的地缘战略思维来说,为降低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大国愿在中间地带建立战略安全缓冲区。如果乌克兰作为战略缓冲区横亘在中间,这对北约和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环境都更为有利,接受这种状态是合理的选择,因为直接军事接触对双方都是危险的状态。但北约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政策。在俄乌冲突之前,尽管北约已经向俄罗斯方向大大推进,并且在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与俄罗斯本土有了近 600 公里的陆地和水面接壤,但总体上北约与俄罗斯之间还存在着宽阔和完整的隔离地带,它们从南到北把俄罗斯与北约远远隔开,在俄罗斯的北方有芬兰和挪威,在它的西方有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它的南方是格鲁吉亚。这其中乌克兰的地位最为重要,它国土面积大,有 60 多万平方公里,在欧洲名列第二,与俄罗斯的陆地和水面边界线长达 2200 多公里,并处于欧洲通向俄罗斯政治和经济中心的重要位置。乌克兰的这一地理特点决定了它对俄罗斯和北约来说都是最有价值的战略地区,布热津斯基对后苏联空间各国的地缘政治地位曾做过深刻分析,其中对乌克兰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估,将其作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布热津斯基断言,乌克兰对改变俄罗斯具有重要作用,没有乌克兰,俄罗斯至多是个亚洲帝国,而如果控制了乌克兰,它将重获成为欧亚大帝国的资本。^① 北约的乌克兰政策也受到这一战略思想的影响,或是体现了这一战略思想。乌克兰在过去三个多世纪是沙俄和苏联的一部分,传统上属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俄罗斯自然希望维持原状;在这一目标无法达到的情况下,俄罗斯退而求其次,将乌克兰中立设为最低目标,也就是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但北约的想法与俄罗斯针锋相对,它不仅不能允许乌克兰落入俄罗斯之手,而且

①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版,第 62 页。

力图把乌克兰纳入欧洲的政治和安全框架。西方在 2014 年无论如何都要把可能倒向俄罗斯的亚努科维奇赶下台,为此不惜推动“颜色革命”夺取政权,也就是俄罗斯所说的“国家政变”,动机也在于此。这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法绝不允许俄罗斯控制奥斯曼帝国是同样的情况。

俄乌冲突爆发前,北约内部对乌克兰的战略定位存在分歧,一部分成员国支持接纳乌克兰,另一部分成员国对此持谨慎态度。美国是最积极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国家,在 2008 年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上,美国就提出接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只是由于德法的反对没有实现,但由此启动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北约的欧洲成员当时虽不赞成接纳乌克兰,但也不接受俄罗斯主张的乌克兰中立地位,不承诺不会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北约常用的解释是不能否定国家的自由选择权,不能改变北约的开放性原则,也不能放弃北约的自主决定权。显然,北约与俄罗斯是在不同的逻辑轨道上,俄罗斯是循着安全思维的逻辑,而北约是按照政治原则的逻辑,以此解释安全政策并不适用。因为北约是军事组织,它的成立和发展都是建立在安全逻辑的基础上,并且这与北约的政治原则没有矛盾的关系,北约可以自主决定接受某一个新成员,也可以自主决定不接受某一个申请国。北约的说法实质上只是一种用来否定俄罗斯主张的托词,目的是为继续向东扩大保留可能。

北约不愿建立与俄罗斯的战略缓冲地带,有悖于欧洲曾经的政策。推动北约做出这一战略选择的根本原因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冷战结束后,北约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由此产生了“战胜国”的傲慢,受到更具侵略性的思想吸引和支配,开始向东扩大。俄罗斯认为,北约曾做出不扩大的承诺,而北约予以否认。当华约和苏联还存在、东西德尚未合并、北约还没有扩大可能之时,北约完全可以用几乎没有政治成本的不扩大许诺来换取苏联同意东西德统一。^①但在华约解散、苏联解体、东西德统一、俄罗斯陷于混乱后,北约即使有

^① 前美国驻苏联大使小马特洛克说,他作为美苏谈判的亲历者,可以证明北约曾许诺过不进行扩大。参见 Jack F. Matlock Jr., “Trump and the Viable Road to Peace in Ukraine,” *Responsible Statecraft*, March 3, 2025,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trump-ukraine-zelensky/>。

过承诺,也不会再遵守。俄罗斯对于北约东扩毫无还手之力,对北约的行为失去制约能力;北约也不再把俄罗斯作为势均力敌的对手。面对一个衰弱的俄罗斯,北约感到不管它做什么,俄罗斯最终只能接受,这似乎已经成了欧洲的习惯性认知。北约的选择是利用俄罗斯的虚弱,建立最大的战略优势,最大限度地削弱俄罗斯的战略地位,使其难以重新成为欧洲的强大对手。与俄罗斯建立战略平衡已经不是北约的选项。

乌克兰国内政治也把乌克兰向北约推得越来越近。乌克兰是从“俄罗斯帝国”独立出来的国家,为巩固独立,它天然地希望离开俄罗斯、靠近欧洲,而且在经济上欧洲更为富庶和发达,融入富裕的欧洲对乌克兰更有吸引力。尽管乌国内也有亲俄力量,俄罗斯也尽力笼络,但 2002 年 5 月,时任乌克兰总统库奇马首次提出了加入北约的目标;2004 年底,通过“橙色革命”当选总统的尤先科把加入北约作为乌克兰的战略选择;2010 年 2 月,被认为是亲俄的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后,宣布乌克兰为不结盟国家,正式取消了加入北约的政策;2014 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乌议会在当年 12 月通过法案,放弃不结盟地位;2017 年 6 月,根据乌议会法案,加入北约被列为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2019 年 2 月,乌克兰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加入欧盟和北约正式写入宪法。由此可见,加入北约问题也是乌克兰国内亲西方和亲俄力量对立较量的重要标志,最终亲西方力量占了上风。

俄乌冲突爆发后,北约又快速实施了第六轮扩大,接纳了芬兰和瑞典。随后,在 2024 年 7 月北约华盛顿峰会上,又宣布乌克兰加入北约已是不可逆转的过程。^①与此同时,北约在积极推进与摩尔多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的关系,并且将其触角也伸到了中亚地区,试图把它们也拉入北约的活动范围。如果北约的设想实现,俄罗斯将在从北冰洋、波罗的海、黑海一直到南方的高加索的广大地域为北约国家所包围;在东方,还有日本乃至韩国的战略呼应。这一战略图景与英国外交官斯·坎宁 170 年前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定下的目标十分相似:“一劳永逸地消灭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让俄罗斯被包围在由独立国家组成的缓冲圈内,

^① NATO, “Washington Summit Declaration,” July 10, 2024,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227678.htm.

以保证俄罗斯永远受到束缚。”^①事实上,现在已经更进一步,19 世纪时欧洲的目标还只是建立一个缓冲圈,而现在北约试图建立的已经不是缓冲圈,而是一条完整的对俄罗斯半包围的军事封锁线。

北约认为这样的安排可令俄罗斯难以动弹,使俄罗斯不敢再对它的周边小国动手,因为它面对的将是世界最强大的军事联盟。而且,一旦发生战争,北约可从北中南三个方向进攻俄罗斯,乌克兰也将成为它最中心的前进基地。历史上,欧洲在对俄罗斯的战争中还不曾有过这种巨大的地缘优势,由此,欧洲认为它的安全将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

但是一旦这种图景成为现实,虽是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噩梦,也不会使欧洲的安全得到更多保证,因为这意味着俄罗斯邻国中的北约国家增多,边界增长,发生冲突的概率增大,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战争门槛将大大降低,而它们之间的任何军事火花都可能把北约拖下水,引爆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战争。实际上,几乎所有与俄罗斯交界的北约国家或北约有意接纳的国家都与俄罗斯存在着边界领土问题,包括芬兰、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格鲁吉亚。边界领土问题是最易引发军事冲突的不定时炸弹,而每一次这样的冲突发生对北约都将是一次痛苦的折磨:既不能不介入,又不值得因此发动战争。因此,北约虽确定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对北约将是福祸未知的重大挑战: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历史关系错综复杂,特别是存在着几乎无解的领土问题,一旦发生冲突,就有把北约拖入战争的可能。因此,北约接纳乌克兰是通向安全之途还是走向战争之路,殊难预料。

特朗普 2025 年执政后,美国的立场发生了急转,转而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暂时冻结了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不过,这没有改变俄乌冲突的地缘政治性质。在美国部分地退出的情况下,欧洲遏制俄罗斯的想法反而变得更强烈,更加坚定地支持乌克兰继续与俄罗斯的战争,甚至抛开美国“单干”也在所不惜。欧洲组

^① [英] 奥兰多·费吉斯著,吕品、朱珠译:《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94 页。

建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者联盟”，筹集主要由欧洲国家提供的新的巨额援乌资金，^①准备向乌克兰派出军队，升级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如德国准备提供“金牛座”导弹）。欧洲的用意不是结束战争，而是延长战争，利用乌克兰削弱俄罗斯，它的基本目标仍是地缘政治性质的，^②这一点与克里米亚战争没什么不同。

二、俄欧相互认知的冲突

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还反映出俄欧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在精神文化上的深层隔阂，双方的相互认知都包含着对立乃至敌视的种子，这成为俄欧冲突的文化精神根源。相互认知的冲突不仅仅体现在精神领域，而且影响到国家关系和外交政策，这一点在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时期极为相似。

18 世纪前，俄罗斯基本处于欧洲政治事务之外。18 世纪初，彼得大帝通过北方战争打开了通向欧洲的“窗口”，并以欧洲为模板对俄罗斯进行全面改造，开始了俄罗斯走向欧洲的过程。此后，随着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和崛起，俄罗斯介入欧洲事务之中，并以大国身份在欧洲政治中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特别是反拿破仑战争后，俄罗斯一跃成为欧洲最强国，对欧洲国家发生的革命进行镇压，被称为欧洲“宪兵”，成为欧洲政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尽管如此，在文明属性和国家身份上，欧洲与俄罗斯却始终难以契合，两者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无形鸿沟。欧洲没有真正接受过俄罗斯，从不把俄罗斯看作是完全的“欧洲国家”。对于俄罗斯的闯入，欧洲本能地排斥，虽然不得不与俄罗斯打交道，但在种族、文化、传统上，始终是把俄罗斯视为异类，甚至不认为俄罗斯属于基督教文明（东正教与天主教和新教同族同宗）。在欧洲看来，

① 截至 2025 年 4 月，欧洲对乌援助总额已超过美国。2024 年 4 月，针对美国将减少对乌援助的可能，北约承诺将向乌克兰提供 238 亿美元长期援助。参见 Martin Fornusek, “Europe’s Overall Ukraine Aid Outpaces US by \$26 Billion, Report Says,” The Kyiv Independent, April 15, 2025, https://kyivindependent.com/europes-overall-ukraine-aid-outpaces-us-by-26-billion-monitors-say/?mc_cid=99a79dd6f2&mc_eid=5d55000942。

② 2025 年 3 月，德国联邦情报局长布鲁诺·卡尔说，希望乌克兰能把战争打到 2030 年，以削弱俄罗斯发动攻击欧洲的能力。参见 Yevheniia Martyniuk, “Kyiv Furious as Germany Suggests Ukraine Should Fight Russia Until 2030 to Shield Europe,” Euromaidan Press, March 9, 2025, <https://euromaidanpress.com/2025/03/09/you-will-not-avoid-war-kyiv-furious-as-germany-suggests-ukraine-should-fight-russia-until-2030-to-shield-europe/>。

俄罗斯是东方国家或亚洲国家,称俄罗斯人是鞑靼人、蒙古人、西徐亚人。在那时欧洲的语境下,东方和西方、亚洲和欧洲不仅仅是地理的概念,它还包含着很强的文化含义:西方和欧洲代表着自由、文明、进步,而东方和亚洲意味着野蛮、落后、专制。欧洲把俄罗斯视为东方人和亚洲国家,就是将其排除在欧洲“文明圈”之外、置于欧洲文化鄙视链的底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称俄罗斯为“北方的土耳其”,是亚洲的一部分;^①19 世纪的法国作家阿·德·屈斯蒂纳认为俄罗斯是“极端的野蛮和极端的文明的结合”,是“拜占庭的细腻与沙漠游牧部落的凶残之间畸形的结合”;^②拿破仑 1812 年进攻俄罗斯时也自称是在守护欧洲基督教文明、抵御俄国的野蛮亚裔部落,把这些“鞑靼人”赶回到他们自己野蛮的冰封荒原。在这种概念下,克里米亚战争也被认为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欧洲的这种意识同样在俄乌冲突中反映出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曾把欧洲比喻为充满诗情画意的“花园”,而称其余世界为野性肆虐的“丛林”,^③俄罗斯自然也是游荡在野蛮的“丛林”中。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对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的理解是一样的。

俄罗斯对欧洲感情更加复杂。俄罗斯处于欧洲文明和斯拉夫文明的交汇地,但两种文明在俄罗斯始终无法和谐相处和融合,而是处于经常性的矛盾和冲突中,俄罗斯时而表现出希望融入欧洲生活主流的狂热,时而又表现出对欧洲的怨恨和轻蔑。^④这两种冲突的思想却有一个共同的心理情感特征,即在欧洲面前俄罗斯人既又自卑又自傲。自傲往往是由于欧洲的傲慢而产生的情感反弹,19 世纪许多原本对欧洲抱有好感和仰慕之情的俄罗斯文人学者在从欧洲返回之后

① [美]安东尼·帕戈登著,方宇译:《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 年来东方与西方的角逐》,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34 页。

② [法]阿斯托尔夫·德·屈斯蒂纳著,李晓江译:《俄国来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卷一,第 6 页、第 118 页。

③ Jimmy Dore Comedy, “EU Foreign Policy Chief: Europe is a Garden, Most of the World is a Jungle: ‘The Gardeners must Take Care of It’,” October 21, 2022, <https://www.antiwar.com/blog/2022/10/21/eu-foreign-policy-chief-europe-is-a-garden-most-of-the-world-is-a-jungle-the-gardeners-must-take-care-of-it/>.

④ [英]以赛亚·伯林著,潘永强、刘北成译:《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8 页。

变为西方的批判者,也有人把这比喻为俄罗斯对欧洲的嫉妒和仇恨。^①排外情绪也在俄罗斯知识界生长,成为俄罗斯传统的文化特征。有人认为,在俄罗斯伟大的古典作家中,可能除了屠格涅夫之外,都受到了排外情绪的影响,有时甚至达到了对西方极端仇视的程度。^②即便被认为是俄罗斯走向欧洲领头人的彼得大帝,对欧洲也没有温情,他学习欧洲,但没有投入欧洲怀抱的幻想,他知道俄国在西方永远只会遭到蔑视和敌视。他说,俄罗斯需要欧洲仅仅几十年,此后就会转过身去,与它说再见。^③

俄罗斯与欧洲的隔膜不仅仅是在情感心理上,也有政治意义和思想内涵。基辛格曾写过,俄罗斯地处欧洲边缘,与欧洲文化相通,但它总是与欧洲历史相背而驰。^④在19世纪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当欧洲国家逐渐走向宪政政体时,俄罗斯是唯一一个仍顽固地坚持君主制度的国家。俄罗斯认为自己国土辽阔,君主专制是最适合的制度,拥戴沙皇是俄罗斯民众的自然天性。俄罗斯保守势力总是以警惕的眼光注视着欧洲,认为欧洲是传播革命思想的危险来源。俄罗斯本土的传统价值观与欧洲格格不入,它认为欧洲文明已经被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理性主义所腐蚀,病入膏肓,没有前途。^⑤而俄罗斯文明——或是作为欧洲文明一部分、或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方式,并负有给人类带来重生和救赎的使命。这也是现今俄罗斯对以自由主义为特征的现代欧洲文明的态度,对欧洲文明的批判不仅是当今俄罗斯思想界的主流,也是俄罗斯

① [法]阿斯托尔夫·德·屈斯蒂纳著,李晓江译:《俄国来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卷二,第207页。

② [英]以赛亚·伯林著,潘永强、刘北成译:《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

③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著,张咏白、郝建恒、高文凤、徐景南译:《俄国史》,商务印书社2013年版,第四卷,第179页。

④ [美]亨利·基辛格著,胡丽萍、林华、曹爱菊译:《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

⑤ [波兰]安杰伊·瓦里茨基著,刘文飞译:《俄国思想史: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译林出版社2024年版,第110页、第118页。

官方的思想,包括普京总统本人。^①

意识形态冲突同样也反映在了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中。尽管是时隔 170 年的两场战争,但欧洲和俄罗斯对它们的叙事却极其相似。欧洲在 19 世纪就有了“自由干涉主义”的萌芽,克里米亚战争前夕,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公开阐释了这一原则,表示在英国认为争议所在之处,或者是不公道行为发生之地,英国都应该投入力量,提供支持。^②而俄罗斯认为欧洲既虚伪,也不理解或不想理解俄罗斯的利益,不愿平等地对待俄罗斯,对俄罗斯只有仇恨和恶意。在斯拉夫派重要思想家波戈金给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报告中就已指出,欧洲人使用双重标准,法国可以夺取阿尔及利亚,英国可以殖民印度,甚至为向中国输出鸦片不惜对中国发起战争;但俄罗斯进入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却引起欧洲的一片哗然,被认为是欺凌弱国,破坏力量平衡,威胁欧洲安全。尼古拉一世对此深表赞同。^③如果把这种情形与俄乌冲突进行对比,很容易看到叙事的相似性:欧洲指责俄罗斯发动战争,恃强凌弱,扩张土地;俄罗斯则指责西方双重标准,它可以轰炸南斯拉夫,推动科索沃独立,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通过“颜色革命”推翻他国政权,却对俄罗斯的行动指手画脚。

如果说精神文化冲突和意识形态层面的不同对推动战争只有间接关系,那么在安全上的相互恐惧则对推动双方走向战争有着直接作用。

不管在克里米亚战争还是在俄乌冲突中,安全恐惧在双方的意识和潜意识中都是极重要的因素。俄罗斯和欧洲在安全问题上存在着根深蒂固和难以消除的恐惧感,相互怀疑对方藏有侵略意图,对本国安全是潜在和持久的威胁。这种安全恐惧由来已久,在欧洲表现为“恐俄症”,在俄罗斯表现为“安全焦虑症”。它们都既有历史根源,也有当时的现实因素。这种恐惧构成了俄欧关系的负面背

① 2025 年 5 月 4 日,普京在“俄罗斯-1”电视节目的采访中对俄罗斯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本质做了区分,认为西方文明崇尚物质主义,而俄罗斯文明追求精神道德。参见“На ‘России 1’ вышло полуторачасовое интервью с Путиным. Главные цитаты — о ядерном оружии, поддержке войны в обществе и будущем преемнике,” Meduza, мая 4, 2025, <https://meduza.io/feature/2025/05/04/v-2014-godu-nachat-svo-bylo-nerealistichno-strana-ne-bylo-gotova-k-protivostoyaniyu-s-zapadom>。

② [英]奥兰多·费吉斯著,吕品、朱珠译:《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97 页。

③ 同上,第 164 页。

景,使双方倾向于只从坏的角度理解对方的行为和意图,这常常导致错判和误判,并可能刺激国家走向冒险和战争。

俄罗斯的“安全焦虑症”是俄罗斯地缘政治思维的一个突出特征,表现在俄罗斯总是缺乏安全感,对安全问题特别敏感,对外部总持有怀疑和不信任,习惯于首先从安全威胁角度看待周边的一举一动。俄罗斯的“安全焦虑症”有其历史根源。俄罗斯历史上战争频仍,特别是在欧洲方向,俄罗斯经历过无休无止的征伐混战。俄罗斯西部是东欧大平原,没有险峻的高山大川阻隔,从欧洲出入俄罗斯的通道畅行无阻。俄罗斯和欧洲的大军无数次进进出出,最为人所知的是1610年波兰人占领莫斯科、统治俄罗斯长达两年之久,莫斯科红场上的米宁和波扎尔斯基雕像就是为他们率领俄罗斯民兵驱逐波兰人所建。1812年法国拿破仑大军占领莫斯科,俄罗斯为赶走拿破仑不得不将整个城市付之一炬。1941年纳粹德国进攻苏联,一直打到了莫斯科城下,使苏联处于灭亡的边缘,更是让俄罗斯人刻骨铭心。所有这一切深刻影响了俄罗斯人的心理,“安全焦虑症”由此积累形成。可以想见,无论北约如何保证它的东扩是为了防御、而不是侵略俄罗斯,都不可能使俄罗斯相信和放心。俄罗斯的担忧虽不无道理,但它的“安全焦虑症”并不都是理性的,也有过虑和夸大的成分。有观点认为,俄罗斯安全焦虑的形成也是一种“安全悖论”的反映,它扩张得越多、地域越广,带来的潜在敌人似乎就越多、不安全感就越强,这使俄罗斯对外国武装入侵患上了一种过度的恐惧。^①

欧洲的“恐俄症”也历日旷久,最早从18世纪开始形成。18世纪俄罗斯帝国大肆向南扩张,迅速崛起为欧亚大国。19世纪初,俄罗斯打败了拿破仑,一跃成了欧洲的“拯救者”,16万俄罗斯大军驻扎到巴黎,这引起了欧洲列强的担忧和恐惧。在克里米亚战争前的几十年里,以“俄国威胁”为主题的各类出版物在欧洲各地盛行,这虽然充满偏见和夸张、是基于对一个亚洲“异类”威胁欧洲自由和文明的想象,但欧洲人对此深信不疑,由此俄罗斯在欧洲被塑造成了一个可憎可怕

^① [英]亚当·查莫斯基著,袁野译:《幻影恐惧:政治妄想与现代国家的创建 1789-184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87页。

的形象:野蛮强悍,喜欢侵略扩张,狡猾和善于欺骗;它怀有对欧洲的野心,威胁着欧洲的安全。用拿破仑时期的外交部长塔列朗的话说,俄罗斯像洪水猛兽,随时企图压垮欧洲。因此欧洲必须驯服“俄国熊”,“拔其尖齿,斫其利爪。”^①欧洲的“恐俄症”一直延续,至今依然余音不绝,并且反映在俄乌冲突中。北约把俄乌冲突看作是俄罗斯控制欧洲的前奏,认为在乌克兰之后,北约国家将是俄罗斯入侵的下一目标。如同俄罗斯的“安全焦虑症”一样,欧洲的“恐俄症”虽不是空穴来风,但也有虚拟和想象的成分,甚至是有意的夸大。欧洲把俄罗斯扩张作为判断的出发点,但扩张需要力量和条件;在不具备条件且力量不占优势的条件下,扩张是不可能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历史上扩张的方向基本是东方和南方,扩张的对象都是弱国、小国;在欧洲方向上,俄罗斯只能到波兰为止——因为俄罗斯从不具有战胜整个欧洲的力量。认为俄罗斯欲征服欧洲既是一种错判,也过于夸大了俄罗斯的实际能力。这里也有必要指出,欧洲虽然指责俄罗斯扩张,但欧洲也曾不停扩张:从历史上看,欧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扩张者和殖民者,它扩张和殖民的范围覆盖了几近大半个地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众多亚非拉国家都曾遭受欧洲的扩张与殖民。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曾遭受过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和纳粹德国的入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其势力范围的认定已经从东欧缩小到原苏联空间。在俄罗斯(苏联)最强盛的时候,在包括乌克兰在内的 14 个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还是一个国家的时候,在俄罗斯(苏联)还拥有强大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时候,俄罗斯也未能控制欧洲;那么现在,在美欧的实力远强于俄罗斯的时候,在北约的军事实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俄罗斯更没有征服欧洲的力量与雄心,也看不到它这么做的合理动机和目的。在俄乌冲突中,俄军用了近四年尚未完全控制乌东四州,而且还是在北约仅提供有限的重武器、没有派遣军队直接参战的情况下。这表明,在现代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方面,俄罗斯明显落后于西方。可以想象,如果是与整个北约作战,俄罗斯将力不从心。不过,这并不能减轻欧洲对俄罗斯的恐惧,因为恐俄已经成为一种不自觉

^① [英] 奥兰多·费吉斯著,吕品、朱珠译:《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90 页、第 193 页。

的意识,如一位美国学者所形容的:在欧洲人的脑海里,俄国军队庞然大物的形象像具有魔力似的迷惑着欧洲;只要想起俄国“压路机”,欧洲国家就感到心惊胆战。”^①欧洲国家相信,与俄罗斯的斗争关系到欧洲的存亡,关系到文明世界的命运,^②因此必须从战略上打败俄罗斯。除此之外,北约也会有意识地夸大俄罗斯的威胁,以维持内部凝聚力和获得更多军费。^③

三、两场战争对俄罗斯的影响

虽然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的结局很可能不会相同,但两场战争暴露出的问题有很大的相似性,也对俄罗斯产生相似的国际和国内影响。

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是基于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错误判断。在对敌方面,尼古拉一世沉浸于自己的幻想,脱离了现实,作出了英法不会介入的误判。他认为英国不会干预,而在俄罗斯侵入比萨拉比亚和摩尔多瓦两公国后,英国是武装干预最积极的推动者,并鼓动法国共同派出军队。英法的参战改变了俄土冲突的性质,使它变成了一场欧洲大战,这也是俄罗斯失败的主因。在对盟友的认知方面,尼古拉一世也缺乏清醒认识。当时,沙俄的主要盟友是奥地利和普鲁士。以维护欧洲的君主制度和对抗民族主义革命为纽带,三国于 1815 年结成了“神圣同盟”。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曾试图与奥地利和普鲁士达成协议,但没有成功。尽管如此,尼古拉一世仍一意孤行,他相信奥皇会记着俄罗斯曾给予他的巨大帮助,不至于与俄罗斯作对。战争爆发后,奥地利和普鲁士不仅没有保持中立,反而加入反俄阵营,对俄罗斯形成新威胁。此外,尼古拉一世还错误地希望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会成为盟友。尼古拉一世相信他进行的是一场保卫东正教

① [美]巴巴拉·W·塔奇曼著,张岱云等译:《八月炮火》,上海三联书店 2018 年版,第 59 页。

② “Biden Begins Speech by Going After Trump and Putin,” CNN, March 8, 2024, <https://www.cnn.com/videos/politics/2024/03/08/putin-trump-russia-biden-state-of-the-union-vpx.cnn>; “‘War is on European Soil —There is Less than 1,500 Kilometers Between Strasbourg and Lviv,’ Says French President,” Fortune, March 15, 2024, <https://fortune.com/europe/2024/03/15/war-is-on-european-says-french-president-emmanuel-macron/>.

③ 这也不是新现象,19 世纪英国哲学家 J. S. 穆勒就曾批评本国政府利用“恐俄症”来增加不必要的军费开支。参见 Robert Skidelsky, “Russophobia—an Epidemic Disease?” The Nation, May 7, 2025,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world/russophobia-an-epidemic-disease/>。

徒和斯拉夫人的圣战,必将得到奥斯曼帝国内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的欢迎和配合。奥斯曼帝国内的斯拉夫人虽然欢迎俄军的到来,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动策应俄军。在对自身力量认知方面,尼古拉一世高估了俄罗斯军队的战斗力。他不了解欧洲的军事技术发展,不了解在工业革命中的落后使得俄罗斯军队的武器装备与欧洲的差距越来越明显:法英的军舰比俄罗斯的军舰吨位更大、火力更猛、使用蒸汽动力,而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前蒸汽动力军舰还很少;彼时俄军仍使用射程 183 米的滑膛枪,而英法士兵已经装备射程达 914 米的线膛枪,且射击精准度也更好。^① 在克里米亚的战斗打响后,习惯于近距离枪战的俄罗斯士兵们甚至不知道敌方的子弹是从哪里飞来的,只能被动挨打。

尼古拉一世的错判,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极度膨胀的傲慢和虚荣。^② 在打败拿破仑后,俄罗斯的军事荣誉达到顶峰。1825 年尼古拉一世登基,执政 20 多年后,他丧失了继位初期的谨慎和克制,变得自大自负,沉迷于俄罗斯的强大之中,产生了一种虚幻的无所不能感。他把克里米亚战前的形势与 1812 年相类比,以他的哥哥、打败拿破仑的亚历山大一世为榜样,相信即使是单独与全世界作战,俄罗斯也会无往而不胜。这使他丧失了对形势客观冷静的判断和思考,并且听不进劝告,固执地坚持己见。

俄乌冲突也是突然爆发,虽然战前对俄罗斯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已有些预测,但多是认为战场将局限于乌克兰东南部要求独立的地区,俄军突然进军基辅、展开如此大规模战争不仅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也出乎通常的认知。即使现在外界对战争的决定过程也一无所知,不知它的突然爆发是出于为达成战役突然性的保密,还是决策是在最后一刻才作出。^③ 不过,目前普遍认为,在决定发动前,俄罗斯也作出了一系列严重错判,其中最主要的是低估了乌克兰的抵抗意志和战斗力,高估了俄罗斯军队的优势和能力,错估了西方可能的强烈反应,认为

① [英]瑞查德·埃文斯著,胡利平译:《竞逐权力 1815-1914》,中信出版集团 2018 年版,第 301 页。

② [英]奥兰多·费吉斯著,吕品、朱珠译:《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89 页。

③ 美情报机构认为普京是在最后一刻决定发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参见 James Risen, “U. S. Intelligence Says Putin Made a Last-minute Decision to Invade Ukraine,” The Intercept, March 11, 2022, <https://theintercept.com/2022/03/11/russia-putin-ukraine-invasion-us-intelligence/>。

西方精英已经腐朽,没有与俄罗斯对抗的意志,轻信战争会迅速取胜。俄罗斯在过去一系列重大行动中,包括俄格战争、出兵叙利亚、合并克里米亚等,轻松获得成功,这使俄罗斯与沙俄一样过于自信和轻率,对战争的困难性和长期性没有认识,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准备不足,预设的战争目标远高出俄罗斯的实际能力,结果导致俄军在战争初期严重受挫,陷入混乱和被动,承受了重大损失。事实上,战前俄罗斯舆论不是没有符合实际的分析,^①但未被决策者采信。如果预先准确判断形势,俄罗斯应会采取不同的形式,制定不同的目标,也许会做出不同的决策。

俄罗斯发动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有多种原因,其中一项是要打破西方的规则,跳出西方制定的游戏框架,以俄罗斯选择的形式与西方对弈。俄罗斯想融于欧洲无门,反对北约扩大无效,即使是对北约发出最严厉的警告,北约依然无动于衷。这促使俄罗斯决定打碎“橱窗玻璃”,将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转到一套新的规则秩序上。通过俄乌冲突,俄罗斯只取得有限的成功——打破了西方的叙事,但没有被普遍接受。俄罗斯虽与乌东地区有深远的历史关系,但以武力夺回难以得到普遍认同,在道德高地的争夺上不占上风,这使得许多非西方国家虽不反对俄罗斯,但也无法支持。俄罗斯因此在国际上陷于被动处境,西方对俄罗斯政治和经济制裁的“合法性”也来源于此。

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都对俄罗斯的国际和国内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克里米亚战争以俄罗斯的失败结束,它打破了俄罗斯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俄罗斯的强大形象蒙上阴影,自1815年后在欧洲的霸主地位终结,俄罗斯不得不把土地归还奥斯曼帝国,在黑海地区被解除武装,沦为欧洲二流强国,屈居于英法之下。

而俄乌冲突虽然与克里米亚战争的结局会不一样,但对俄罗斯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在外交层面,对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存在多重影响。俄罗斯单独一个

^① Mark Galeotti, “Anti-War Broadside Highlights Nationalist Critique of Putin,” The Moscow Times, February 7, 2022,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22/02/07/anti-war-broadside-highlights-nationalist-critique-of-putin-a76280>.

国家顶住了世界最强大军事集团的巨大压力和孤立,经受住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严厉的经济金融制裁,显示出了俄罗斯坚强的国家意志和不可小觑的国力,这甚至超出了俄罗斯自己和西方的预料。可以断定,这次战争结束后,尽管西方对俄罗斯的看法会更负面,但它对俄罗斯的声音不能不更多重视。在欧洲战后政治、经济、特别是安全关系的重构中,不管俄罗斯是否直接在场,都是必须考虑的重大因素。另外,以往有人单单以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俄罗斯的国力,认为它不过相当于某些中小国家。但国内生产总值只是构成国力的基础,而不是全部要素,除了国内生产总值外,地域、人口、地理位置、军事能力、联盟体系等动态因素,以及战略智慧、意志力、力量运用、国家组织能力等静态因素,都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显然,任何中小国家都不会有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表现出的这种国力。

俄乌冲突也使俄罗斯军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继承下来的强悍形象受到损害,俄军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摧枯拉朽地击败乌克兰,也缺乏达成已设定的重大战略目标的能力,俄乌冲突久拖不决就是最好的证明。尽管俄罗斯对乌克兰占更多优势,但无法完全左右战争的进程,即使完全控制新入俄的乌东部四州全部领土也十分艰难和缓慢,费时 8 个月才将轻易攻入俄罗斯本土库尔斯克地区的乌军驱走。不过,也应该看到,俄罗斯对战的不仅是乌克兰,而是整个西方。西方对乌克兰在资金、武器、军事指导、信息情报、技能培训上提供支持,在政治、经济、金融、交通运输等方面对俄罗斯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乃至对于继续与俄罗斯进行经济、贸易、金融往来的国家也实行制裁,以迫使其断绝与俄罗斯的合作,减少俄罗斯所需的物资材料和资金收入。就此而言,俄罗斯能以一国之力抗衡整个西方,仍是十分强悍的。而且,俄罗斯迄今为止没有进行全国动员。

俄乌冲突使外界对俄罗斯国家形象的影响表现出两极化的评价。虽然一些国家视俄罗斯为敢于挑战西方霸权的猛士,但西方将俄罗斯看作是侵略者,俄罗斯的国家形象再一次被涂上了阴暗的色彩。俄罗斯在欧洲受到孤立,俄罗斯人的尊严受到严重损害,俄罗斯文化也成禁忌,在包括文化、体育、学术活动等领域的许多国际活动中被排除在外,俄罗斯的文化和艺术家也频频受到抵制。虽然

俄乌冲突总会过去,但这一影响不会完全消失,它会成为西方认识和评价俄罗斯国家属性的一个事实。

在经济层面,战争虽然展示出俄罗斯经济的强大韧性,但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在过去 20 多年里,尽管俄罗斯政府一直努力,但经济结构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能源和原材料仍占主导地位,在新科技革命中落在后面;制造业存在空心化,在研发和制造代表发达水平的技术产品,如芯片、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和通讯设备以及飞机、汽车、高铁、轮船、新能源、精密机床等高端装备制造业,俄罗斯都缺少世界领先的产品和品牌。在世界经贸体系中地位不高,在国际产业链中没有显著的位置,没有形成自己关键产品的配套和完整的产业链,缺乏大规模的生产制造能力,俄乌冲突爆发后,从最简单的民用无人机配件到复杂的精密车床等,都要通过进口才能满足国内需要;消费品严重依赖进口,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际商品的消费国但不是生产国;就连最引以为傲的军工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依靠苏联留下的老底子,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与北约存在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一些武器装备都依靠从西方国家进口的元件。

在安全层面,俄乌冲突恶化了俄罗斯的安全环境,包括宏观安全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即使是在俄乌冲突结束之后,俄欧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很有可能都将处于军事对峙中。一方面,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对俄罗斯周边安全环境影响重大。这两个国家虽然都是小国,但它们是俄罗斯的邻国和近邻,芬兰与俄罗斯的边界有 1340 公里。两国长期奉行中立政策,但这一坚持已久的传统却在俄乌冲突中被放弃,两国迅速加入北约。这样一来,芬兰和瑞典与波罗的海三国连成一线,共同从西北构成了对俄罗斯的防御带。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对俄罗斯与原苏联国家的关系也造成了影响,它虽然拉近了俄罗斯与一些国家的关系,但也与另一些国家的关系有所疏远;它增加了周边小国对俄罗斯的敬畏,但也使它们看到了俄罗斯弱点,让它们在对俄关系上更自信、更独立,甚至敢于在一些问题上挑战俄罗斯,同时更积极和更大胆地发展与西方的关系。

俄罗斯的改革通常都是在外部压力下发生的,这在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中再次得到验证。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打破了俄罗斯对自身强大的沉迷,看

到了与欧洲的差距,这在俄罗斯国内激起了要求变革的思潮和压力,推动俄罗斯在国内政治、军事建设和对外政策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在国内政治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终于在 1861 年废除了存在三个半世纪之久的农奴制,这是俄罗斯国家的一次历史性变革和进步。在军事方面,战后俄罗斯开始进行现代化改造,装备先进武器,改进指挥系统,实行全民征兵制,设立军区,修建铁路网,改善后勤系统,提高士兵的军事技能和文化水平等等。在外交领域,俄罗斯外交界传奇人物戈尔恰科夫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外交大臣达 25 年,卓有成效地帮助俄罗斯收复失去的权益,重新恢复俄罗斯在欧洲的强国地位。

俄乌冲突的结局不会与克里米亚战争一样,因此它对俄罗斯的冲击不会像克里米亚战争那么强烈,不过可以断定,战争结束后,俄罗斯也会发生一系列变革。如同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一样,俄乌冲突也使俄罗斯既为它强大的生命力骄傲,也看到了它在某些领域的落后和不适应,同时形势的变化也使俄罗斯对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等有了新要求,因此改革势在必行。

虽然变革的规模和深度只能在战后才可见全貌,但某些趋势已有所显现。俄乌冲突强化了俄罗斯的自我身份认同,用俄罗斯学者的话说,就是使俄罗斯更加认清了自身及其在世界上的位置。^① 俄罗斯更加明确了自身独特文明的国家身份,不再以融入欧洲为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俄乌冲突使俄罗斯再次体验到了它传统的“孤独”意识,因此俄罗斯更加强调不依靠任何人,保证在所有领域的主权,形成能独立保证国家生存和发展条件。^② 俄罗斯将以本土价值观发展国家思想,完全摆脱自由主义的影响。俄乌冲突对俄罗斯国内精英集团的构成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政治精英集团会进行重组,金融精英集团会发生重构,社会精英团体也将有新的形成途径。战争和制裁使俄罗斯对自身的经济强项和弱点都有切身感受,因此,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也将势在必行。军事改革更是不可避免。事实证明,俄军 2008 年开始的新军事改革存在重大弊病,它的基本认识和改革方向

① Dmitry Trenin, “Russia is Undergoing a New, Invisible Revolution,” *Russia Today*, April 2, 2024, <https://www.rt.com/russia/595266-ukraine-west-pushed-russia/>.

② “Заседание Совета п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у развитию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проектам,” Кремль, декабря 5, 2024,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75762>.

都有很大偏差,不符合现实的要求。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军事技术的发展、现代战争形态的变化,都会使俄罗斯进行新的军事改革。在国际政治领域,俄乌冲突没有使俄罗斯在战略上收缩,现在俄罗斯更倾向于形成独立于西方的国际秩序和区域安全体系,它提出的欧亚安全体系也可以说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对于俄罗斯外交还有一个相似的强力推动,那就是它们都促使了俄罗斯的“转向东方”。两个“转向东方”出现在相同的国际环境下,即俄罗斯在欧洲方向的发展受阻,通过“转向东方”来缓和或对冲来自西方的战略压力,寻找其他的发展空间和可能性,弥补在欧洲方向的损失。俄罗斯向东发展不是始于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这两次事件不是“转向东方”的根源,但它们促使了“转向东方”战略的形成,并提供了重要动力。

尽管两个“转向东方”名字相同,出现的外交背景相似,基本定义一致,但它们的具体内容和性质十分不同。第一次“转向东方”的基本内容和性质是向东方扩张和殖民。在这个持续半个世纪的过程中,俄罗斯向东扩张到了太平洋海岸,向南征服了整个中亚,控制了高加索,形成了沙俄帝国在东方最终的空间框架并固定和延续下来,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

尽管有着某种历史的呼应,但俄乌冲突之后的“转向东方”与19世纪有极大不同,这在它的内容、目标、定位上都能反映出来,对此也应有客观的认识。俄罗斯这次“转向东方”的基本目的是加深与亚洲的关系,基本方式是通过合作,重点领域是经济和外交。从形成背景来说,其宏观背景是世界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俄罗斯希望跟上这一国际政治经济转型的趋势;中观背景是俄向欧洲方向发展受阻,融入欧洲的设想失去前景;微观背景是俄乌冲突爆发,西方对俄全面制裁,俄罗斯在欧洲方向被切断生路,必须在其他方向取得突破。

四、结 语

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的大量相似性也许不一定构成定律,但它们确实提供了一个观察俄乌冲突的特别视角,并对更深刻地理解俄欧关系提供了事实

和启示。俄乌冲突不仅是现实国际政治的产物,也是俄欧关系的历史延续,它发生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但在更宏观层面上也是俄欧冲突的反映。

地缘政治是俄欧关系的结构框架,或者说地缘政治因素决定着俄欧关系的基本状态,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依然没有改变。俄欧冲突往往是因地缘政治利益碰撞而致,反过来说,俄欧合作通常也来自于地缘政治矛盾的缓和。

身份认同是俄欧精神隔阂难解的症结。欧洲过去从没真正接受过俄罗斯,不认为俄罗斯属于欧洲文明,视俄罗斯为东方野蛮国家。现在欧洲依然把俄罗斯排除在欧洲“花园”之外,将俄罗斯归于蛮荒的“丛林”之中。而俄罗斯对欧洲仍抱着复杂的心态,既有向往和崇尚,也有怨恨和自傲,不满欧洲对俄罗斯的排斥和双重标准。国家身份认同依然使俄罗斯纠结,走向西方还是东方仍然折磨着俄罗斯。

从克里米亚战争到俄乌冲突,相互恐惧都是推动战争发生的重大因素。欧洲的“恐俄症”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而俄罗斯的安全焦虑也似乎注入了它的天性,难以去除。相互恐惧导致冲突,冲突更加深相互恐惧,成为俄欧安全的恶性循环。

在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中,俄罗斯在诸多方面表现得十分近似,包括在决策、判断、军队建设、战争准备等等方面,这种类比虽然有些简单化和浅表化,但它们也能反映出俄罗斯的某些天性、特点、风格、偏好。

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都极大地改变了俄罗斯的国际处境和安全环境,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的内政外交,并产生了深远后果。在内政上,克里米亚战争促使俄罗斯进行了重大的政治、社会 and 军事改革,俄乌冲突也会对俄罗斯发生相似的效应。在外交上,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都推动了俄罗斯“转向东方”。